

●张乃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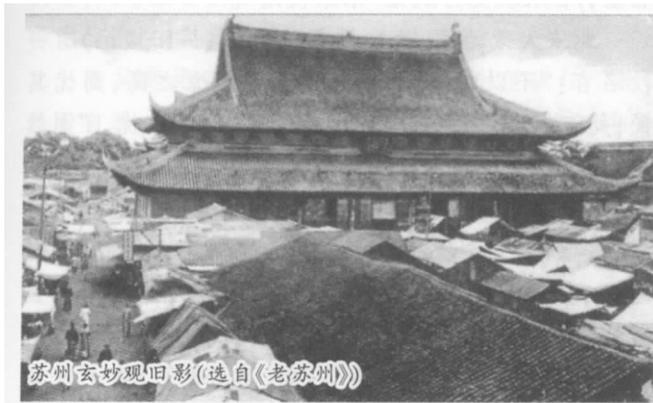
返朴归真 亲近自然

——吴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元素研究

吴文化作为特定空间分布的综合性文化,是一个内涵深邃、结构复杂的庞大系统。既有原生态文化在世代传承中所构筑的草根平台,又有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后中华文化的渗透,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后儒家文化的浸润,还有东晋南朝玄学兴起后道家文化的影响等等,难以尽述。分析吴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因子,对于深刻认识吴文化的内核与精髓,乃至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,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道家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,创于春秋末老子,发展于战国时期的庄子。因为老子用“道”来概括这种学说的核心,所以称道家。

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。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三国王弼注:“道不违自然,乃得其性,‘法自然也’。法自然者,在方而法方,在圆而法圆,于自然无所违也。”这里的



苏州玄妙观旧影(选自《老苏州》)

斤的工程师。面对报纸、广播等媒体频频出现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、“不怕做不到,就怕想不到”等词汇和观点,干部中“宁左勿右”造假成风。“官出数字,数字出官”的风气因此越来越严重。

当时,干部中流行这么一个潜规则,高指标大家心知肚明,“大家完不成,何容一家愁”。谁定的生产指标高,谁就干劲足,思想先进;否则,就会被扣上右倾思想的帽子,“拎帽戴帽”的事时常出现。浦庄乡(公社)在1958年内,曾调整4位党委书记(包括一段时间内无

“自然”,指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状态和宇宙运行的客观规律。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,主张“明白入素,无为复朴”^①、“淡而无为,动而以天行”^②,追求一种“乘天地之正,而御六气之辩,以游无穷”^③的崇高境界。

在吴文化中,“道法自然”的理念深彻骨髓。人们醉心林霭湖石,迷恋梅兰竹菊,偏爱小桥流水,敬天畏命,亲近自然。

在居住环境的选择上,吴文化核心区的苏南人似乎特别钟情于“林”、“泉”。元六合成廷珪,晚遭乱世,避地吴中,卜居松江,生性爱竹,虽然奉母居于闹市,却在庭院中遍植翠竹,有山林意趣,并将住所命名为“竹轩”。诗文集四卷亦以《竹轩》名。^④明无锡高攀龙性喜水居,以漆湖边有小洲,“其(小洲)外池周之,其外堤周之,其外湖周之”,“主人即洲作居,以水为垣”,偃息其中,“以水为娱,泊然自得”,以至于“目之所接,意之所遇,魂魄之所安,无非水也”。^⑤主人似乎将自己融入了大自然,达到一种“忘乎其为我”、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吴县书画家陈道复所居名五湖田舍,有茂林修竹,花源柳埭,鸭阑鹤圃,酒帘渔艇,极幽居之胜。晚岁词翰之重不减沈周、文征明,张寰曾评论说:“有云林之飘洒而无其癖,同石田之高洁而通于和。”^⑥同县诸生陆治曾屡次放弃被选为廪生的机会,督学嘉其文才德行,令他为贡生,他坚决拒绝,衣处士之服种茉莉于支硎山下,终身自守泊如无二志。^⑦清常州钱维乔诗文有幽奇灵秀之气,山水画笔意轻灵,气体清逸,归田后葺“半园之半”,艺花种竹三十年,所撰《半园之半记》,体现了主人的林泉高致。^⑧

正职,由副职负责)。客观上,造成有些干部为保“乌纱帽”,违心地胡吹、瞎指挥。

50年过去了,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,简直不可思议,但确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态势。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,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不从实际出发,不按科学规律办事,华而不实,弄虚作假,是会付出代价的。

(责任编辑 刘俊)



江南古典园林是吴文化的精华,其中蕴涵着依恋自然的价值观、回归自然的生活观。人们通过叠山理水,将自然山水移植、复制、浓缩到有限的空间里,并加以艺术化,从而通过园内昏晨晦明的变化和草木枯荣的更叠,使人“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,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”,完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。从这个角度说来,与其说是古典园林,毋宁说是“城市山林”。

由于职业、经济条件等的限制,不可能人人都水居山处、林栖花眠,也不可能家家叠山理水,户户亭台楼榭,但他们却可以通过文字,去潜心林木山泉的“野趣”。考《续文献通考》谱录类共收莳花赏园之作69种,其中官修1种,不著撰人7种,爵里无考3种,其余58种中,江苏籍学者所撰著作有21种,占同类已知私家著作总数的35.59%,正可以说明这样的问题。

在建筑风格上,苏南虽然也雕梁画栋,但和我国北方的金碧辉煌、闽广的光彩艳丽不同,注意保持木质的本色,显得清朗淡雅。门楼、窗棂、枋檩等所雕图案,也和南方建筑的元宝、财神迥异,常常选择梅兰竹菊等植物、鱼猴鹿蟾等动物,以及王母、鬼谷、麻姑、刘海、东方朔等道家人物为题材。

在饮食习惯上,苏南人口味较为平和清淡。《清稗类钞》在谈到苏州菜的特点时说,“其烹调之法,皆五味调和”。夔宁、夏明顺《吴地饮食文化》共收吴地名菜33种、家常菜64种、风味小吃25种,其中116种都设有《原料》目,所收辛辣类调料极少。

在诗文创作风格上,苏南地区的基本格调以清新典雅婉丽为主。清《四库全书·集部》共收苏南地区自晋迄清历代作家的诗文集、词曲集167种,经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定,这些作品的风格绝大部分都属于清雅型。其中,风格评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“清”,以及性质与它比较接近的“淡”、“洁”等,共出现65次;其次是“雅”,以及性质与它比较接近的“典”,共出现50次。

人们在敬天畏命、亲近自然的同时,还常常把自然的万物人格化、人性化,赋予它们人的品格和情感,视之为能与人进行精神交流的生命体。在他们看来,大自然的一山一水、一石一沙、一草一木,都生机勃勃,格外亲切。长洲(今属苏州)俞琬纶的《祭半齿文》,以自己半颗牙齿脱落、主人将其卜葬于“花下少人行处”,并作文祭奠为题材展开叙写,读来令人潸然泪下。南京松江府华亭县陆树声的《燕居六从事》,将友人所赠的藤、竹、木、玄木六枚手杖完全拟人化,将它们视为自己的“知己”,是与自己形影不离、亲密无间的“燕居六从事”,字里行间透露了作者对这些手杖无

比依恋的深厚感情。

二

在道家哲学体系里,宇宙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只有“我”和“物”两大类,“人”不仅指物质意义、行为意义上的人,而且包括精神意义上的人。人只有在精神世界里返朴归真、“虚心实腹”(《老子》第三章),做到心境恬淡、清静无欲,才能实现与社会的平衡,和宇宙的融合,从而升华到“人天合一”、“人天相应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: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。”同上《知北游》:“人之生,气之聚也。聚则为生,散则为死。若死生为徒,吾又何患?故万物一也”)、“超越自然”、“超越自我”、“道法自然”的境界。

的确,苏南人不仅在物质上追求环境清幽有趣,陈设古朴有雅趣,生活清闲有逸趣,还把精神上恬淡寡欲、心境如水、超然洒脱当作人生的更高境界。早在商末,太伯三让天下,被孔子推为“至德”(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·太史公曰》)。春秋时,公子季札继承太伯之风,面对吴王馀祭传位给他的遗命,再一次上演三让王位的历史佳话,世称“至德第三人”。东晋郗鉴向王氏求婚,王家诸郎“咸自矜持”,唯独王羲之“在床上坦腹卧,如不闻”,而郗鉴竟也对其他人视而不见,偏偏对王羲之刮目相看,脱口而出:“正此好!”(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)后来演变为成语“东床快婿”。

北宋大政治家、大文学家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有一段名言: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”固然立意高远,千百年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,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。但老庄“超越自我”、“物我同一”、“物我一体”,即“我”与自然、“我”与社会对立统一宇宙观的流露,却是不容置疑的。联系此前“登斯楼也,则有心旷神怡,宠辱偕忘,把酒临风,其喜洋洋者矣”一句,和《老子》第十三章“宠辱若惊,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?宠为下,得之若惊,失之若惊,是谓宠辱若惊”,《岳阳楼记》中“物我一体”的思想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。宋代理学兴起和明王阳明的心学形成后,人们更是放大了庄子“心斋”(《庄子·人间世》)主张,力图在意念上通过对自己善与恶、无欲与物欲的检讨和修炼,净化心灵,提高自身的修养。如清昆山王哲生,归养后读书敦行,经义性理,每天都用札记来检考自己的言行意念。曾经邀请讲学诸人集会,每次会期静坐七昼夜,反省自己。(宣统《江苏省通志稿·人物志》本传)

三

“道法自然”的本意指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,由此老子又生发出无为的哲学命题。因为在他看来,道作为宇宙本体自然而然地生成天地万物,就其自然而然来说,天道自然无为,而就其生成天地万物来说,天道又无所不为。所以他在《老子》第三十七章提出: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”老子并且主张,要将天道自然无为推衍到人道的自然无为。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“无为”思想,认为“有天道,有人道。无为而尊者,天道也;有为而累者,人道也”(《庄子·逍遥游》),主张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”(《庄子·应帝王》)。所以在诸子百家中,道家最为关注人的个体性,倡导“自然”、“自在”、“自爱”、“自适”、“自得”、“自乐”、“自事其心”,提倡保持个体的独立性。

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后,儒学思想成为我国地位最为显赫、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文化。儒学主张“克己复礼”、“用行舍藏”,以道德属性为准则、以自我约束为根本,通过限制乃至牺牲人的情感、欲望来实现社会伦理体系的构建。东晋南朝时期,随着玄学对儒学的冲击,人们力图冲出世俗价值观和社会规则的樊篱,摆脱君权及封建等级秩序的束缚,崇尚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情感世界,向往生活上享受人生,精神上自得其乐,人格上自强自立。这种人的本性的觉醒,和人生价值的追求,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回归。

晋吴郡吴县(今属苏州)张翰少年时便纵任不拘,任心自适。会稽贺循奉命赴洛阳,路经吴县,在船中弹琴,张翰原本不认识贺循,听到琴声便上船与贺循论琴。听说贺循要赴洛阳,又欣然和贺循同船一起远赴洛阳,连家人也没有通知。到洛阳后,齐王辟张翰为东曹掾,一日“见秋风起,因思吴中菰菜羹、鲈鱼脍,曰:‘人生贵得适意尔,何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!’遂命驾便归”。别人问他:“卿乃可纵适一时,独不为身后名邪?”张翰答道:“使我有身后名,不如一杯酒。”(《晋书·文苑》、《世说新语·识鉴、任诞》)宋苏州顾禧,博通古今,著书甚富,于光福山中闭户读书,先后闲居不出者50年,名重乡里。筑室蜗居,题名“漫庄”。“漫”者,不受约束、随心所欲之谓也,以“漫庄”名所居,寓意无拘无束自由自在。(道光《苏州府志》本传)明南京朱之蕃,万历状元,累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。后母亲病故,回家守丧,不再复出。慕陶渊明为人,在谢公墩北建小桃源,收藏青铜器和书画,吟咏赏玩自得。病危时,对儿子说:“人生在世,聚则成形,散则为气,只不过一去

一来之间的事罢了。”儿子问身后之事,一句话也没说就咽气了。(同治《上江两县志》本传)溧水茆钦,万历进士,历江西佾事、大理寺卿、摄刑部尚书等,不久辞职而归。曾对友人说:“人生在世,只不过是来世上暂住几天罢了。”于是赋《自挽诗》以抒其志。有人



苏南道教胜地茅山的老子塑像

将他与陶渊明相比,说:“过去陶渊明作《自祭文》,现在先生赋《自挽诗》,真不愧于陶渊明!”茆钦回答道:我和陶渊明比起来感到惭愧的地方,是我辞职太晚了。(清《金陵通传》本传)

因为追求心理上的充实、精神上的享受,而不是物质上、生理上的满足,所以即使物质困乏他们也会自得其乐,其乐融融。武进张以谦,善诗文,有晋唐人风格。居于芙蓉湖,杜门却扫,不与外事,一身衣服穿了20年,破洞连连,像渔网一样,他也毫不在意。妻子死后不再续娶,有人钦慕他的为人,想要把女儿嫁给他,他笑道:我家里贫穷,经常挨饿,千万不要把你的女儿嫁给我让她蒙羞。(光绪《武进阳湖县志》本传)

把人道的自然无为当作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,视功名利禄为粪土、荣华富贵如草芥,自然会选择远离尘世,结庐而居,结伴而耕的人生道路,过起隐士的生活。老子之所以“以自隐无名为务”,正是为了“修道德”。庄子之所以辞漆园吏“终身不仕”,是为了“自快”、“快吾志”。(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)张翰之所以归隐鲈乡,也是这个原因。当官场险恶、人情冷漠、人欲横流的现实与自己所追求的自然无为、任心自适相抵触时,人们更容易选择隐退。这些就是古代苏南逸民较多、隐逸文化比较发达的所在。宋吴县张庆之,绝意仕进,好为山水之游,曾仿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作《海峰逸民传》,以伯夷、蒋诩、陶潜、司空图自比。又称自己深沉似海,峻厉似峰,自号海峰野逸,以示自适自乐的旨趣。(康熙《吴县志》本传)宜兴元溥,幼习举子业,宋亡,绝意进取,自号耘轩。丹徒苏绍学问渊博,工诗,



隐居不仕,自号东山樵隐。明宜兴吴纶,建别墅两座于山溪之间,南面一座称樵隐,北面一座称渔乐,自比陶渊明,号心远居士。武进恽本初举贤良方正,除内阁中书,弃官归,更名向,号香山老人。江宁贺确于学无所不通,下笔有古风,以菊有隐操,自号友菊居士。明清之际的龚贤字半千,又字野逸,一作野遗,号半亩、柴丈人。清新阳(今昆山)王鸣韶字鹤溪,其兄王鸣盛要他参加科举,他却说:我知道你要我参加科考是对我好,可是我对此一向看得很淡。王鸣盛在京城做官,王鸣韶在家中侍养父母,闭户读书,于家中的大堂上题匾“逸野”,旁边又辟屋一间,里面悬着蓑衣和斗笠,用来表达自己淡泊的志向。(清《嘉定县志》本传)这些人的名号无不透露出崇尚隐逸的信息。

苏南古代隐士主要有仕而归隐、官隐两栖、隐于野、隐于朝等几种。其中,仕而归隐就是先考取功名,出仕做官,光宗耀祖后再离开官场,归隐于乡,享受天伦之乐。在士大夫们的心目中,这种情况最为“圆满”,也最为普遍。官隐两栖就是顺利时入世为官,不顺利时避世为隐,有投机之嫌,不足为论。隐于野又有两种情况。一是不受聘而隐。宋宜兴蒋之勉为浙西大儒,当道屡次推荐他入仕,他屡次不应。(《江苏省通志稿·人物志》本传)江阴许恕著有《北郭集》,部使者推荐他担任澄江书院山长,不就。(嘉靖《江阴县志》本传)丹徒苏庠隐于京口(今镇江),五召不起。其子苏扶,工诗嗜书,酷肖其父。贫甚,郡太守召之,他却对弟子说:“吾何以获知此人?特以先世隐名,哀吾贫而周之,奚忍以吾父名卖钱耶?”固辞不往。(《丹徒县志》本传)丹阳邵 慤为北宋高士,范仲淹守润曾荐他为官,他却理也不理。范仲淹从镇江移任越州,路过丹阳,特地拜访他,又吃了个“闭门羹”,只好留信给他:“今春与张侍御过丹阳,约诣先生,维舟水边,闻先生归山。所谓其室则迩,其人甚远,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!”(《重修丹阳县志》本传)明昆山范能,喜吟,尤工书法。永乐初被征,赋诗郡守,愿养母全其天年,日以著述为事。无锡尤文学以宋儒为宗,领乡荐即隐居不出。孝宗遣行人赍书征之,以母老力辞。胡滢、周忱交荐之,终不就。二是千方百计避仕而隐。南宋丹阳孙林为乡试第一,有司饯送赴部,孙林却不愿应选,为县官所迫,只得勉强动身。既就试对策,故意极言时政之失,考官见了,不敢录取,只好放归。人人都为他抱不平,孙林反倒如释重负,说:“此吾志耳。”平时读书味道之余,和骚人墨士啸傲林壑间。朝廷闻其贤,征为秘阁侍书,辞不赴。(《重修丹阳县志》本传)明长洲沈周工诗,善画,长于书。郡守

要荐他为贤良,他却决意隐遁。父亲死后,有人劝他出仕,他说:“若不知母氏以我为命耶,奈何离膝下?”王恕、彭礼等连续几任巡抚都礼敬之,想要召至幕下,他都以母亲年老极力辞谢。

隐于朝就是虽然身在官场,但却不问政事,“居官无官官之事,处事无事事之心”,以读书养性为务。清初溧阳马世俊,顺治进士,康熙间历任翰林院修撰、侍读学士。这些都是闲职,古人谓之“清要”。对此马世俊有着独到的见解,常说:“馆臣无他职,读书即其职。”因此朝夕一编,送往迎来,歌舞宴会,大多谢绝不预,惟务研习。(光绪《溧阳县续志》本传)无锡秦朝舒,乾隆十三年(1748)进士,由礼部郎中出知楚雄府。一日,巡抚过境,秦舒正在廨中山亭读书,听说巡抚过境仍手不释卷,直到将一卷书读完才出城迎接,可是巡抚早就走了。巡抚听说他贤能,当时也没有怪罪他,可是时隔不久他还是不明不白地丢了官。(光绪《无锡金匮县志》本传)

古代苏南地区的隐逸虽然没有显赫的官阶,也不一定腰缠万贯,但社会地位却很高,从州县衙门到贩夫走卒,无不钦敬有加。嘉靖《太仓州志》卷七卷八、万历《昆山县志》卷六卷七均为人物传,以下分别设立宦绩、文学、隐逸、孝友、列女、艺术、杂传、恩典和仕宦、贵戚、隐逸、独行、游寓、列女、艺能、仙释八个门目,隐逸都位于“三鼎甲”。中国古代是官本位社会,但在弘治《江阴县志》中,隐逸却位居名宦、宦达之前。在人们心目中,隐逸品德高洁,行为高尚,所以又称隐士为高士。吴江古代有三高祠,奉张翰和助句践灭吴后急流勇退泛舟太湖的范蠡、隐居甫里品茶顾渚山垂钓吴淞江的陆龟蒙为“三高”。康熙《镇江府志》卷三十九、乾隆《丹徒县志》卷十七收录的对象都是隐逸,却题名“高隐”。一个“高”字,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隐逸在当地的社会地位。

注 释:

- ①《庄子·天地》。
- ②《庄子·天道》。
- ③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
- ④光绪《六台县志》本传。
- ⑤高攀龙《水居记》。
- ⑥乾隆《吴县志》本传。
- ⑦乾隆《吴县志》本传。
- ⑧《清代毗陵人小传》本传。

(责任编辑 尤 岩)